

地区动荡与治理

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根源研究

汪波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西欧穆斯林群体中日益突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导致了西欧国家宗教极端恐怖主义事件明显增加，而且还促使大批极端主义分子加入中东的伊斯兰国武装。对于西欧穆斯林群体中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究其原因首先是西欧国家穆斯林群体多年来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而引发的不满，同时还有西欧国家右翼政治势力为其政治利益发表的反穆斯林言论和政府公共政策对穆斯林群体自尊造成的伤害，最后还有穆斯林群体中的部分激进分子出于身份认同和利他主义动机为维护群体利益和报复西方社会而采取的极端主义恐怖行为。

关键词：西欧；穆斯林群体；极端主义

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5）02-0038-14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4JJD81001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KX161058）、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及上海高等学校中东研究智库项目资助。

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4年3月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和2005年7月伦敦地铁连环爆炸案，到2015年1月令世界震惊的《查理周刊》袭击案，西欧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发的所谓“本土滋生的恐怖主义”正在变得日益严重。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表明西欧穆斯林群体，尤其是穆斯林青年一代中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极

端主义倾向。在西欧地区国家中，穆斯林人数大约为1500到1700万。近年来，随着穆斯林群体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的不断加强，那些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穆斯林青年除了在本土制造恐怖主义暴力事件外，还大批前往中东地区加入当地的武装行动。在当前活跃在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中，就有来自西欧地区的数千名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除了直接的暴力行动外，西欧国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还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主要是在公开场合穿戴头巾或是展示其他穆斯林独特的文化象征。对于西欧穆斯林群体中这种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西方的研究大都将其归咎于伊斯兰理念的内在性质。他们认为，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与生俱来，因而与西方的冲突也将不可避免。一些西方研究人员，诸如刘易斯等人还特别强调，穆斯林群体过度沉湎于他们对历史上兴盛时期的骄傲和怀念，因而其中一些人对当前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充满了恶毒的仇恨。对此亨廷顿也解释说：“对于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而是在伊斯兰这种不同的文明中，民众始终深信他们文化的优越性，同时又对他们势力的衰落耿耿于怀。”但本文认为，西欧国家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咎于伊斯兰理念的内在性质，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穆斯林群体在西欧国家遭遇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政治方面的排斥和压制，还有西欧国家右翼政治势力的反穆斯林言论和政策对穆斯林群体利益和自尊的伤害。而极端主义倾向中少数激进分子的暴力恐怖行动，则是出于身份认同驱动的维护群体利益和尊严的利他主义动机。

一、穆斯林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处境

穆斯林群体在西欧国家的存在有着漫长的历史。近年来，穆斯林群体在西欧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中日益加深的整体困境，已经成为群体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不断加强的根本原因。当前西欧穆斯林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有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原因主要是这个群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不利处境。一个群体因为社会不平等而引发不满的问题，戈尔（Ted Robert Gurr）早在20世纪70年代

“欧洲十五国穆斯林数据最新排行”，2013年3月5日，<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94249-1.shtml>。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London: Phoenix, 2003.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217.

就从理论上提出过“相对剥夺是反叛的根源”的经典解释。此后，斯图尔特（Frances Stewart）也分析过穆斯林群体在西欧国家面对的结构性的不利处境。尽管穆斯林人口在西欧代表性的法国已经高达10%，但他们却广泛面临着从就业和低收入方面的经济歧视到公众生活中的政治代表性不足。因此，这种现象可以看成是穆斯林群体在西欧国家遭受的阶层不平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阶层不平等主要是一种以社会群体为基础的不平等，而不是文化或种族同质社会中的不平等。在西欧，穆斯林群体所处的这种阶层不平等，并不仅仅是他们在文化特征方面遭到的歧视，而主要是体现为更高的失业率以及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低于平均水平。这就是说，西欧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宗教身份而失去平等的机会，从而陷入一种“社会结构上的困境”。从目前的情况看，西欧主要大国穆斯林群体的境况虽然有所差异，但他们遭遇的不利处境则大体相似。

在西欧的主要大国中，法国是当前整个欧洲国家中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据估计法国的穆斯林人口约为640万，占法国总人口的10%，其中约有200万人拥有法国公民身份。在法国，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群体相比，其社会地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处于不平等地位。在法国穆斯林青年中，未完成中学教育的比例要大大高于非穆斯林青年。巴黎蒙田研究所（Paris-based Montaigne Institute）的调查还发现，法国北非裔人口的失业率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出30%。对于北非穆斯林移民来说，在服务性行业找到工作的机会也非常有限。由于服务行业涉及人际交往，因而零售业和酒店业方面在聘用服务人员时也存在着广泛的种族歧视。但是法国监狱的在押犯人中却以穆斯林为主体，他们的人数达到法国全部在押犯人的60%。另外，法国穆斯林的居住区也是环境极其恶劣，大多数穆斯林人口都集中居住在大城市周边郊区的低收入居住区。这些居住区里，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Frances Stewart, “Global Asp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HIs): Inequalities Experienced by Muslims Worldwide”, mimeo, 2008.

John E. Roeme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欧洲十五国穆斯林数据最新排行”，<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94249-1.shtml>.

<http://pewforum.org/publications/reports/muslims-europe-2005.pdf>

Barbara Franz, “Europe’s Muslim Youth: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of Discrimin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8, No.1, 2007, p.10.

Marvin Perry and Howard E. Negri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slamic Terror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大多是“长期失业的男人和阿拉伯血统的妇女以及新来的北非移民”。法国政府把这些地区确定为“敏感城市地区”，其中就包括巴黎的克利希苏布瓦区（Clichy sous-Bois），这也引发了穆斯林群体的强烈不满。

德国的穆斯林人口要少于法国，大约为320万，占全德国总人口的4%，但却是西欧地区土耳其移民最集中的国家。在德国，穆斯林群体无论在社会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同样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些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的高等教育机会，土耳其移民往往难以企及。与其他经合会国家相比，在德国获得中等以上水平的教育，通常更需要依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的教育背景。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CG）2007年的报告，目前在德国的高等院校中，土耳其裔学生的人数为25,000人，甚至低于来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27,000人。不仅如此，土耳其移民一般也很难找到工作培训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失业率要远高于德国本土居民。不过，德国穆斯林群体的居住情况要好于法国，因为德国政府规定住房管理部门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为移民和少数族裔安排住房，有些城市的住房标准是每栋居民楼中的外国人比例不能超过20%，从而避免了少数族裔聚居的情况。然而，德国50%以上的土耳其裔居民依然抱怨他们在寻找住处的时候会受到歧视。在政治权利方面，德国从1913到1999年一直实施的“帝国公民法”明确规定被称为“客籍工人”的移民不能享有政治权利。他们虽然可以享受德国的社会福利，但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却没有政治代表权，从而剥夺了德国穆斯林移民的基本政治权利。2000年德国虽然颁布了新的公民法，移民的政治权利也有所改善，但很多政党马上就开始要求政府加强对移民的控制。对于德国国内的伊斯兰激进主义倾向，德国宪法保卫局（Verfassungsschutz）一直进行着严格监控。德国法律规定，国家和州一级政府官员都可以采取强制措施来保卫宪法，其手段主要是密切监视所有注册或地下民间社会团体潜在的反民主和破坏宪法的行动。因此，那些被政府视为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人，将无法获得公共住房或被取消居住权，甚至丧失公民权。

在英国，穆斯林人口约为280万，占全国人口的4.8%，其中46%出生在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16岁以下。虽然英国穆斯林的处境要略好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但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同样受到不平等待遇。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英国穆斯林青少年在学前教育方面处于结构上的低水平。

Marvin Perry and Howard E. Negri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slamic Terrorism*, p.102.

Joel S. Fetser and J. Christopher Soper, "The Roo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tate Accommodation of European Muslims' Religious Practices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42, No.2, 2003, pp.247-258.

与英国白人团体相比，英国巴基斯坦裔和孟加拉裔儿童参加学前语言课程的人数只有前者的57%。在青少年的整个教育过程中，36%的穆斯林学生就读期间往往会因为学习能力不够而中途退学。就业方面，16到24岁的穆斯林青年中有20%的人找不到工作。另外，大约三分之一处于工作年龄的穆斯林缺少工作技能，这也是英国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中比例最高的。英国政府200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穆斯林群体的失业率是英国平均失业水平的三倍。在英国穆斯林人口中，25岁以上的成人中失业人数达到14%。相比之下，英国全国的失业率仅为4%。另外，英国穆斯林居住区也面临隔离问题。在伦敦的巴基斯坦人社区，住有14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伦敦的四个区。其中伦敦的纽汉区（Newham），是英国排名第四最糟糕的区。在政治上，英国穆斯林群体也没有充分的代表权。2005年，英国议会中只有不到2.3%的议员来自少数种族群体，但他们代表的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10%。只有在英国警察中，2009年少数族裔的人数达到了25%。

根据美国国务院《2008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of 2008）的说法，西班牙穆斯林的人口大约为115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非西班牙裔的移民，其余的则是皈依穆斯林的西班牙人。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班牙的伊斯兰信徒一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临近伊斯兰国家，尤其是摩洛哥的移民人数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本土人士皈依穆斯林的人数快速增长。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西班牙的穆斯林也面临着明显的歧视。2000年的一项实地调查发现，很多西班牙穆斯林都抱怨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受到非穆斯林同学的嘲笑，这些穆斯林孩子被侮

Frances Stewart, "Global Asp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HIs): Inequalities Experienced by Muslims Worldwide", mimeo, 2008.

Barbara Franz, "Europe's Muslim Youth: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of Discrimin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8, No.1, 2007.

Robert Briggs and Jonathan Birdwell, "Radicalization among Muslims in the UK, Microcon Working Policy", Working Paper 7, 2009, http://www.microconflict.eu/projects/PWP7_RB_JB.pdf.

Barbara Franz, "Europe's Muslim Youth: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of Discrimin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8, No.1, 2007.

Frances Stewart, "Global Aspects and Implications of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HIs): Inequalities Experienced by Muslims Worldwide", mimeo, 2008.

"Police aim more Muslim staff", BBC, 23 November, 2004, <http://news.bbc.co.uk/1/hi/uk/4032987.st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2008", <http://www.state.gov/g/drl/rls/irf/2008/108473.htm>

辱性地称为“摩尔人”。米诺（Gema Martin-Munoz）主持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许多西班牙的摩洛哥移民虽然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申请相应工作时也会遇到困难，因为“很多西班牙人不愿意和那些看起来像摩尔人的人共事”。另外，西班牙居住区的隔离，也导致穆斯林大多集中居住在马德里、巴塞罗那以及其他安达卢西亚城市的郊外，而这些地区则明显表现出一种经济不景气的景象。2003年以来，西班牙的监狱中大约有6000名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服刑，他们大多都是因为一些轻微的罪行被判罪。

在荷兰，穆斯林人口为9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4%。他们当中三分之二是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的移民，另外大约40%是出生在荷兰的第二代移民。荷兰虽然传统上是一个强调以多元文化方式对待移民的国家，但荷兰穆斯林在社会生活中同样也遭受着不平等待遇。在就业方面，几乎一半以上的土耳其人和60%以上摩洛哥人从事的都是非技术性工作。相比之下，荷兰本土人口中只有不到30%的人从事非技术性工作。在2005年9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试验中，试验者把150份工作简历投寄给相关的荷兰公司。其中一半使用的是荷兰人的普通姓名，另一半则使用了外国的伊斯兰姓名。结果，75份荷兰姓名简历中，69人被邀请面谈。而75份外国姓名的简历中，只有33人被邀请。在教育方面，40%的土耳其人和45%的摩洛哥人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荷兰的第二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中，中途退学的比例也非常高。在混合学校中，穆斯林儿童的学业表现也远低于荷兰本土的儿童。在社区方面，穆斯林居住区分离的情况在荷兰也非常明显。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大多集中居住在那些房价较低的区域，而这些地区的犯罪、贫困和污染则更为普遍。

二、右翼政治势力对穆斯林群体利益和自尊的伤害

除了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不平等遭遇外，西欧国家穆斯林群体还遭受着右翼政治势力言论和政策的伤害。这主要是西欧国家一些政党和政治派别为了寻求自身的政治利益，近年来一直在刻意宣扬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威胁，并且得到了一些民众的认同。2001年，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在竞选中就制作过这样一幅竞选广告。广告中描绘了一位年轻

Rajiv Mehrotra, "The Looming Shadow of the Crescent: Islam in Spain", *Perspectives on Business and Economics*, No.23, 2005, pp.85-95.

Geert Driessen and Michael S. Merry, "Islamic Schools in the Netherlands: Expansion or Marginalization?", *Interchange*, Vol.37, No.3, 2006, pp.201-223.

的金发女孩，女孩的旁边写着这样一段话：“当她退休时，我们将成为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结果，这个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增加了70%，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200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鼓吹穆斯林群体威胁论的法国国民阵线党(Front National)领导人勒庞(Jean-Marie Le Pen)，也在和希拉克(Jacques Chirac)的竞选中也赢得了17%的选民支持。2007年8月，奥地利卡恩顿州州长海德(Joerg Haider)，由于公开承诺在他管辖的州内禁止建造清真寺和伊斯兰尖塔，因而使得奥地利右翼政党在2008年9月的大选中赢得了28%的选票。很明显，西欧国家近年来出现的那种恐惧穆斯林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散布穆斯林威胁论的政治家们夸大的言论以及对这种情绪的政治利用所造成的。不仅如此，这些号召反对穆斯林的政党，例如英国的英国国家党(British National Party)以及荷兰的弗杜恩党(Lijst Pim Fortuyn)，还全力推动其所在国家的执政党对穆斯林移民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政策。这些都对西欧国家的穆斯林群体的整体利益和自尊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具有右翼倾向的政治家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发表的那些煽动对穆斯林移民仇恨的言论中，往往会有意释放一些错误的信息，作为扩大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一种简便方式。这些言论对于公众产生影响力的程度，则取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是否需要为一些社会问题寻找替罪羊或是他们自己在个人生活中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并非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否真实。结果，一些煽动穆斯林仇恨的政治家的言论虽然可能不值得相信，但对于公众中的一般成员来说，却无法通过长期的考察来分辨这些言论的真实性。因此人们大多会放弃对这些仇恨言论真实性的考证，而是相应这些言论的号召并采取公共行动来对抗所憎恨的目标。特别是，在诸如伦敦地铁爆炸案这种涉及穆斯林恐怖主义的重大暴力行动发生后，所有主流社会群体都会完全相信右翼政治家那些煽动仇恨的言论，甚至把身边所有的穆斯林都视为恐怖主义者。不仅如此，当一个社会中有足够多的选民相信这些言论的时候，政府就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并采取公共行动。这样不仅会使得公众对穆斯林的恐惧成为社会公认的事实，而且更会直接损害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和自尊。结果，那些以反穆斯林和反移民形式通过的立法，会使得大量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家庭成员难以团聚。

Joel S. Fetser and J. Christopher Soper, "The Root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tate Accomodation of European Muslims' Religious Practices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42, No.2, 2003.

Edward L. Glaes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atred",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0, No.1, 2005, pp.45-86

同时，政府还会强行推行以消除种族差异为目标的国家一体化考试，其内容包括语言和文化常识。不仅如此，政府甚至还会颁布禁止戴头巾和面纱的法令，来阻止展示伊斯兰标志和象征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国家那些标榜遵循比例代表制原则的决策机构，也难免因为少数反对穆斯林的政党的煽动性的言论而影响其公共政策，从而对穆斯林群体造成伤害。

在这种群体利益和自尊遭到伤害的情况下，西欧穆斯林群体中也难免出现日益明显的极端主义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特征象征性展示行动甚至恐怖主义暴力事件。这不仅在西欧国家中加剧了对穆斯林对恐惧，而且也使得西方与伊斯兰之间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变得日益普遍。在这种关于能否与穆斯林文明和谐相处的争论中，像荷兰这种传统上重视多元文化的国家也出现了“荷兰人与穆斯林文化战争”的说法。在英国，致力于推动文化交流的融合委员会（Commission on Integration and Cohesion）的态度，也明显地从多元文化主义和强调差异性逐步地转向了一体化。甚至在英国这个禁止在竞选公开场合讨论伊斯兰恐怖症议题的国家，政府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反恐法律和措施也变得日益严厉。在整个西欧，反对移民尤其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情绪正在不断加强，丹麦和荷兰甚至还出现了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在这种背景下，那些试图在竞选中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右翼政治家会进一步发表那些造成人们对于像穆斯林群体感到恐怖的种族主义信息，并在竞选中把社会的各种问题，诸如犯罪和失业等，都归咎于穆斯林群体的不断扩大。而非穆斯林的多数群体中的部分人，则很容易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处境较差的人，他们和穆斯林移民交往的感受往往都是负面的。结果，在欧洲国家那些右翼政党利用反穆斯林情绪而赢得广泛支持的同时，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则变成了公众对社会安全担忧的主要根源。对此，马修德建立的研究模式表明，被视为公众利益的安全恐惧与穆斯林群体激进团体对西方仇恨之间正在产生一种相互影响的作用。其结果就是西欧国家穆斯林群体在经济和政治权利方面的处境更为困难。而西欧国家政府的压制穆斯林的政策造成的结果，也进一步加剧了激进穆斯林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对抗。由此可见，穆斯林群体中出现

Maykel Verkuyten and Ali Aslan Yildiz,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3, No.10, 2007.

Robert Briggs and Jonathan Birdwell, "Radicalization among Muslims in the UK, Microcon Working Policy", Working Paper 7, 2009, http://www.microconflict.eu/projects/PWP7_RB_JB.pdf.

Mansoob Murshed, "A Not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dentity Based Fear and Hatred", *Peace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No.7, 2008.

的极端主义倾向并非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来源于西方对伊斯兰和穆斯林的恐惧或者说是本质上的厌恶。这种恐惧并不仅是针对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潜在的暴力倾向,而且还包含了对于那些非暴力的穆斯林集会和 cultural 特征展示的普遍憎恶。

值得关注的是,荷兰近年来由于国家的“社会和主流群体对于不同种族和文化差异社会的移民表现出一种拒绝接纳和要求对其进行同化的趋向”,从而导致了暴力事件的频繁发生,其中最有影响的是2002年因宣称伊斯兰文化落后的政治家富图恩(Pim Fortuyn)被暗杀的事件,还有2004年电影制片人梵高(Theo van Gogh)被摩洛哥裔青年穆罕穆德·布耶里(Mohammed Bouyeri)谋杀的事件。这两起事件发生后,都使得荷兰本土白人群体与穆斯林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加剧。富图恩被暗杀后,他建立和领导的公开宣称反对穆斯林的政党在荷兰大选中获得了18%的选票,赢得了议会中26个席位。制片人梵高被谋杀后,更是激起了荷兰国内前所未有的那种带有十字军意味的反伊斯兰行动和言论。根据荷兰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监测中心(Dutch Monitoring Centre on Racism and Xenophobia)的记录,谋杀事件发生后,仅一个月内就发生了106起针对穆斯林目标的暴力事件,80%的荷兰民众都赞同使用更加严厉的手段强行对少数族裔进行融合。2009年4月的一项调查也表明,40%的荷兰民众赞同右翼政治家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的反穆斯林观点。与此同时,荷兰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2.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希望和穆斯林做邻居。相比之下,只有5.17%的受访者不希望和外来移民为邻。这个结果表明,穆斯林已经成为荷兰所以少数族裔中最不受欢迎的群体。在这种群体利益和自尊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荷兰穆斯林群体做出的回应就是对他们的荷兰公民身份表现出冷漠。在乌特勒支(Utrecht)、维库屯(Verkuyten)和宜尔迪兹(Yildiz)等三个地区对104名土耳其荷兰人所做的调查中,65%的人对他们的荷兰人身份认同度表现为中性或认同度较低,甚至否定其荷兰身份。这就是说,他们“反对荷兰社会的

Maykel Verkuyten and Ali Aslan Yildiz,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3, No.10, 2007, p.1446.

Galen A. Irwin and Joop J.M. Van Holsteyn, “The 2002 and 2003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Electoral Studies*, Vol.23, No.3, 2004, pp.551-557.

“Wilders’ ideas enjoy 40% support”, *Dutch News*, January 19 2015, http://www.dutchnews.nl/news/archives/2009/04/wilders_ideas_enjoy_40_support.php.

Zan Strabac and Ola Listhaug, “Anti-Muslim prejudice in Europ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from 30 Count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o.37, 2008, p.278.

不满，已经发展成一种所谓的反抗性身份认同”。

三、极端主义行动中的身份认同和利他主义动机

对于西欧国家的穆斯林群体来说，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不利处境，加之右翼政治势力对其整体利益和自尊造成的伤害，已经导致某种历史积怨和现实困境共同发挥作用来推动极端主义倾向的形成。不过，这种极端主义倾向最终体现为极端主义行动，还需要通过身份认同和利他主义动机对穆斯林群体中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部分个体成员的驱动。

在身份认同的动机驱动过程中，就像文化认同在所有种族和宗教群体中会发挥某种作用一样，穆斯林群体中的个体也会不由自主地在其穆斯林身份的基础上表明态度。不过，不同个人对其穆斯林身份认同也会表现出程度不同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作为基础的穆斯林身份与其多重身份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传统“文化主义”的观点往往将伊斯兰这种宗教视为一个一层不变的整体，并认为其中每个个体都会选择一种单一的宗教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每个个体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拥有多元化的身份。在西欧穆斯林群体中，每个个体可能同时是一位穆斯林、一位欧洲公民、一位民主信奉者、甚至一位对文化差异性和人权表示尊重的理性主义者。

应当指出的是，在西欧穆斯林群体中，那种对群体社会地位表示强烈不满的个体认同，正是穆斯林极端主义行动出现的主导因素。对于极端主义倾向转化为极端主义行动与那种对群体地位不满和个体身份认同之间联系的理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利他主义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种理论作用的前提是，个体对整体做出贡献时获得的幸福感源于整体利益得到的维护。因此，利他的感受特别适用于那些信奉某种带有宗教色彩理想的人。从理论上来说，利他主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就是作为贡献者的个体完全是为了整体的利益或是推进某项事业。作为贡献者，他并不一定能够获得整体利益得到维护带来的好处。他所获得的幸福感，只是因为能够为某种目的服务。另一种是倾向性的利他主义，贡献者只是对某种行动表示支持，但并不要求直接参与。他

Maykel Verkuyten and Ali Aslan Yildiz,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3, No.10, 2007, p.1450.

Amartya K. Sen, “Violence, Identity and Pover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5, No.1, 2008, pp.5-15.

所得到的幸福是因为能够支持某种整体的事业，而且是由别人而非他自己来采取直接行动。例如，有些人热衷于社会福利，他们虽然自己并不参与社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但他们会因为别人参与这些行动而感到快乐。根据这种理论，在欧洲穆斯林群体的极端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行动的联系中，显然包含了这两种形式的利他主义作用。

除了利他主义的理论外，还可以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理解极端主义行动中身份认同的动机。根据阿克鲁夫 (George Akerlof) 的解释，人们态度转变的动机并不仅仅来源于对某种事业的理解和赞同，而且还来源于和自己认同感相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他们所属群体中其他成员的行为方式。这种趋同性就像某个个人与同一教派中其他成员在共同祈祷所产生的功效。由于群体在社会等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将直接关系到群体中所有个体的集体自尊，因而那些基于行动之上的身份认同的功效、群体其他成员的行动、其他群体的地位等所有要素都会对具体的行动产生明显的动机作用。在这里，个体行动的动机不仅源于他自身行动产生的功效，而且源于和他同一群体的其他具有同样想法的成员所采取的极端行动。在自我身份认同或自我形象塑造之外，这种行动也是出于对群体社会地位和自尊的维护。其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是源于这个群体整体的社会处境以及政府对待群体的政策。在西欧国家中，正是由于穆斯林群体整体低下的社会地位，才最终促使群体中某些个人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而放弃他们主要的国家身份认同并转向那种不受赞同的宗教和种族身份认同。

在阿克鲁夫提出的有关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之外，盖尔通 (Johan Galtung) 也指出了在群体处于不平等时个体极端主义行动发展的特点。他认为“暴力攻击最可能产生于群体社会等级地位的不平衡。在个人的体系中，人们可能采用的是犯罪方式；但在群体的体系中，出现的就是暴力抗争的形式。”另外，西门 (Bernd Simon) 等人还综合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来分析极端化倾向转化为极端性行动的问题。他们特别强调，身份认同能够加强共同面对的不利处境的意识，形成一种与对立面对抗以及打击对立面的行动。因此，身份认同有助于解释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西欧地区国家不断加强的原因。尤其是在那些出生或成长于这些国家的青年一代中，伊斯兰宗教已经成为“构成群体身份认同的最重要的因素”。特

George Akerlof and Rachel E. Kranton,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5, No.3, 2000, pp.715-753.

Johan Galtung, "An Editoria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1, No.1, 1964, p.98.

Bernd Simon and Bert Klandermans, "Politicised Collective Identi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merican Psychologist*, No.56, 2001, p.323.

别是在那些对穆斯林移民强调采取同化政策的国家，这些属于穆斯林群体的年轻一代更可能转向他们群体内部作为身份认同根源的伊斯兰宗教，并以此作为减少自身身份不确定性的方式。另外，这些受到歧视的穆斯林群体还可能采取以宗教为基础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存在的意识，以“加强群体内的身份认同并和主流群体保持距离”。

这些理论表明，来自西欧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行动中个体行动者的动机，正是穆斯林群体在西欧社会中遭遇的那种集体屈辱感。而西欧国家政府对这种倾向性的打压，往往只会是火上浇油，促使这些极端主义者更加决心反抗。另外，西欧地区参与极端暴力行动的个体参与者和中东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一般都不是未受过教育的生活贫困者。无论是英国的伦敦爆炸案或是荷兰的梵高谋杀案中，行动者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穆斯林青年。很明显，西欧国家出现的这些个体恐怖主义或是极端主义行动主要还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动机，其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群体而非个体的社会自尊地位。而这些个体恐怖主义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抗议他那些贫困和被压迫同胞而并不仅仅是他自己所处的困境。因此，在这种极端主义的行动中，不仅有身份认同的要求，而且还有某种让个体行动者被吸引的因素。因为这里要求行动个体所采取的是极其危险甚至导致自我毁灭行动，而且行动者也无法直接从他所支持的事业中获取效益。所以，只有当一个个体在群体需要和个人自主之间做出那种孤注一掷的选择时，“自杀式炸弹”这种极端主义行动对于他们来说才可能是合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威慑对于个体的极端主义选择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尽管在极端主义行动中个人的成功率很小，但仅仅靠打压依然无法阻止极端主义者采取行动。

以上分析表明，无论是2005年秋季法国城市暴乱中大批出生于北非的青年在法国城市郊区的放火行为，还是2015年1月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第二代移民在巴黎发动的《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体现的都是这种穆斯林群体不平等现象导致的个人身份认同所驱动的极端主义暴力行动。在法国，近年来面对勒庞领导的

Maykel Verkuyten and Ali Aslan Yildiz,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 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3, No.10, 2007, p.1449.

Tony Addison and Mansoob Murshed,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s a Spillover of Domestic Disputes in Other Countries", *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 Vol.16, No.2, 2005.

Alan B. Krueger and Jitka Maleckova, "Does Poverty Cause Terrorism", *The New Republic*, June 24, 2002.

Ronald Wintrobe, "Can Suicide Bombers Be Rational", Paper prepared for the DIW Workshop 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Global Terrorism, 2002, <http://www.docin.com/p-942882.html>.

右翼反移民政党（Front National）获得的支持度不断升高，一批在法国出生或长大的第二和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已经对法国主流社会形成了强烈不满和愤恨。那种沦为二流公民以及他们在住房甚至加入俱乐部方面所遭受的歧视，已经“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认为应该把自己的身份首先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法国人”。与此同时，在整个西欧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中，年青一代对宗教的兴趣也日益强烈。法国报纸（Le Monde）发表的调查数据表明，当前穆斯林去清真寺和进行祈祷的情况比1994年有了大幅度提高。他们回归伊斯兰信仰是要以此作为自我身份认同和自尊的依据，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已经被西欧国家的主流社会抛弃。正如一位西欧穆斯林青年所说的：“如果得不到社会尊重，就会让你变成一个担惊受怕的人。这就促使你公开穆斯林身份，因为伊斯兰信仰能让你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穆斯林。”

当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发动的恐怖主义攻击已经遍及西欧多个国家的时候，人们已经不能继续把穆斯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视为一种个人因为无法获得工作机会而实行的非正常行为方式的犯罪，或者把这种情况仅仅说成是穆斯林与基督教之间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因为在这种简单化的解释中，通常忽视了穆斯林群体自尊受到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且也未能认识到在群体遭到整体不平等处境下个体加强个人穆斯林身份认同所包含的意义。本文认为，穆斯林极端主义像任何极端主义一样，并不是在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真空中产生的。同时，穆斯林极端主义也不是在文明的对话中形成的，因为对话本身已经排除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伊斯兰宗教的本质属性。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西欧国家穆斯林群体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是穆斯林群体自尊受到伤害的根本原因。而西欧国家右翼反穆斯林政治势力对穆斯林群体的攻击，则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群体与西欧社会主流群体之间的“恐惧”和“仇恨”，这也是西欧伊斯兰极端主义倾向产生的基础。特别是，在穆斯林群体遭遇社会经济不平等和政治压制情况下，不仅催生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而且还促使这个群体中的年轻一代在加强穆斯林身份认同的同时，还会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为维护群体的整体利益和尊严而采取极端主义的暴力行动。目前，这些带有极端主义的穆斯林青年不但大批聚集到远在中东的伊斯兰国武装中，而且也开始在西欧国家内部展开恐怖主义攻击。西欧国家虽然正

Barbara Franz, "Europe's Muslim Youth: An Inquiry into the Politics of Discrimin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18, No.1, 2007, p.100.

Marvin Perry and Howard E. Negrin,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slamic Terror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188.

在全力展开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如果不能真正从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改变穆斯林群体的不平等地位，从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好消除对穆斯林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恐将难以从源头上消除西欧国家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发展趋势。

A Research on the Reasons that Cause the Formation of the Islamic Extremism in West Europe

WANG Bo

(Wang Bo, Ph.D, Professor at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Islamic extremism arose in the Muslim groups in West Europe not only caused more and more terrorist actions of the religious extremism in these countries, but also led many extremists to join the IS force in Middle East. As for the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Islamic extremism in the West European Muslim groups, the first is the unequal treatment that the West European Muslim groups suffered for many years has led to their discontent; the second is the anti-Muslim speech and views given by the right wing politicians in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the public policy taken by the governments have harmed the Muslim groups' interests and self-esteem; the third is some extremists motivated by the identity and altruism have taken terrorist actions to defend the groups interests and to revenge the Western society.

Key Words West Europe; Muslim groups; Extremism

(责任编辑：李 意)